



# Columbia Center on Sustainable Investment

A JOINT CENTER OF COLUMBIA LAW SCHOOL  
AND COLUMBIA CLIMATE SCHOOL

## Columbia FDI Perspectives

哥大国际投资展望

总编辑: Karl P. Sauvant ([karlsauvant@gmail.com](mailto:karlsauvant@gmail.com))

执行编辑: Chioma Menankiti ([clm2249@columbia.edu](mailto:clm2249@columbia.edu))

哥大国际投资展望 (Columbia FDI Perspectives) 聚集各方观点以供讨论, 作者所表达的观点并不能代表哥大可持续投资中心 (CCSI) 及其相关方的立场。

No. 402 2025 年 2 月 3 日

### 补贴战与现代产业政策

Kenneth A. Reinert\*

近六十年前, Harry Johnson 讨论了经济民族主义在经济决策中的作用, 并特别提到了制造业的重要性。Johnson 曾指出 (第 183 页): “重点将放在制造业上, 而在制造业内部, 则侧重于某些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行业, 这些行业代表着工业能力。”

如今, 这种老式的制造业民族主义正与美国、中国、印度、韩国和欧盟的技术民族主义相结合。Luo Yadong 将“技术民族主义” (p. 553) 描述为“一种系统性竞争思维, 它将跨境技术交流直接与国家安全联系起来。”

这一新趋势构成了所谓的现代产业政策或新产业政策。例如, 欧盟和美国都在呼吁在包括 5G 网络、人工智能、量子计算、机器人、生物科学和半导体等多个技术领域对抗中国。实际上, 美国已达成罕见的两党共识, 要在所有的“基础技术”上削弱中国。

与此同时, 中国也在广泛的技术领域推行自己的现代产业政策, 以实现“自力更生”, 为此资助了“中国制造 2025”和“中国标准 2035”计划; 印度有自己的“印度制造”和“生产关联激励”计划; 欧盟有其“2020 年欧洲工业战略”; 韩国则有其“K-Chips 法案”, 目的都相似。

这些努力是由补贴推动的, 其使用增加影响了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 (FDI)。例如, 美国的工业补贴高达估计的 1 万亿美元, 全球估计数字更高。因此, 世界正处于

一场补贴战之中，其影响尚未经过深思熟虑。虽然存在 Pigovian 适当补贴理论 来应对正外部性，但目前补贴战的动机很少有证据表明是基于谨慎的经济思考。这场补贴战对外国直接投资有影响，可能会因大规模的政府干预而扭曲 FDI 流动。多国企业（MNEs）现在正在争夺国家政府的补贴，并在无法获得时与之对抗；任何成功获取这些资源的行为都附带条件，限制了 MNEs 对市场变化的响应能力以及追求传统企业战略的能力。这些条件的例子包括基于国家的供应商限制和出口管制。

一种模式是补贴支持选定的外国直接投资项目。例如，台湾半导体制造公司因应美国的补贴，在美国进行新的项目投资。它宣布在亚利桑那州投资高达 400 亿美元的两家半导体制造厂的计划。尽管其中一家工厂很快就遇到了 熟练劳动力短缺 和美国工会冲突的问题，但最近的 66 亿美元补贴足以使公司承诺建设 第三家工厂。

印度也采取了同样的模式，通过补贴 富士康和联想 等公司，作为其“印度制造”计划的一部分，以提升电子制造业。这里的目标更多地是进行组装，而不是推动技术前沿，但这仍是一个趋势的例子。

一些这样的努力可能会适得其反。例如，现实是美国半导体芯片制造的成本比其他地方 高出多达 50%，这表明支持这种生产的补贴是低效的，甚至可能增加家庭和企业的成本。

另一种模式是支持国内企业并与外国企业合作。例如，日本补贴半导体制造商 Rapidus 就是这种情况。同样，有些情况下，补贴基于民族主义投资计划附加严格条件，隐含地限制外国直接投资，试图发展“可信供应商”体系。例如，SSN-AUKUS 潜艇项目 就是这种情况。

补贴战涉及一组特定的国家，主要局限于 G20 国家。即使是较小的高收入国家（如瑞士、新西兰）也将无法参与这场游戏。大多数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也将因资源不足而被排除在外。尽管进口更便宜的补贴商品会带来好处，但这些国家才是真正基于学习型的制造业补贴可能有意义的地方，但它们将无法追求这一政策路径。

该怎么办？从经济效率的角度来看，最佳做法是限制补贴，因为它们具有零和性质和有害的 财政影响。它们也应接受 WTO 关于补贴和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 的规则审查。与其庆祝补贴的增长，不如认识到这标志着基于规则的多边体系的破裂，而这种破裂将使跨国公司的生活更加复杂。

或者，更有建设性的做法是，主要参与者可以回归到补贴战开始前正在形成的开放创新模式。开放创新认识到国家和跨国公司之间的技术互补性，并通过合作实践（如交叉许可、非股权联盟和战略供应商协议）利用这些互补性。尽管政治现实可能限制开放创新模式仅限于盟友，但实用主义的包容性是前进的最佳路径。

---

\* Kenneth A. Reinert ([kreinert@gmu.edu](mailto:kreinert@gmu.edu)) 是乔治梅森大学沙尔公共政策与政府学院的教授。作者谨此感谢 Simon Evenett, Ravi Ramamurti 以及 Jeffrey Schott 在同行评审中提供的有益帮助。

如果附带以下致谢，这篇展望中的材料可以被再版：“*Kenneth A. Reinert, 《补贴战与现代产业政策》, 哥大国际投资展望, No. 402, 2025 年 2 月 3 日。*”经哥伦比亚可持续投资中心许可转载。（<http://ccsi.columbia.edu>）。”请将印件发送至哥伦比亚可持续投资中心 [ccsi@law.columbia.edu](mailto:ccsi@law.columbia.edu)。

获取更多信息，包括关于提交给哥大国际投资展望的信息，请联系：哥伦比亚可持续投资中心，Chioma Menankiti, [clm2249@columbia.edu](mailto:clm2249@columbia.edu)。

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投资中心(CCSI)作为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气候学院的联合中心，是一个领先的应用研究中心和论坛，致力于可持续国际投资的研究、实践和讨论。我们的任务是制定与传播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，和分析当前的政策性问题，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国际投资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。该中心通过跨学科研究、咨询项目、多方利益相关者对话、教育项目以及资源和工具的开发来承担其使命。获取更多信息，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<http://ccsi.columbia.edu>。

### **最新的哥大国际投资展望**

- No. 401, Sandro Zolezzi, 《影响评估：提高外国直接投资促进工作的重要工具》，2025 年 1 月 20 日
- No. 400, Sol Picciotto, 《迈向跨国公司统一税收》，2025 年 1 月 6 日
- No. 399, Laura Yvonne Zielinski, 《外太空的投资保护》，2024 年 12 月 23 日
- No. 398, Sophie Meunier 和 Sarah Bauerle Danzman, 《对外直接投资管制：欧盟新的经济安全工具？》，2024 年 12 月 9 日
- No. 397, Josh Kallmer, 《高科技公司的外国直接投资决定因素》，2024 年 11 月 25 日

所有先前的哥大国际投资展望均载于：<https://ccsi.columbia.edu/content/columbia-fdi-perspectives>。